编者按

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契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农村发展道路、创新乡村振兴推进模式、建强乡村人才队伍，是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内生动力、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的关键所在，亟需学界深化理论阐释、总结实践经验、明晰发展路径。

本次专栏由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经济学院青年学者胡宁宁博士主持，围绕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集结三篇优秀研究成果，立足理论与实践、兼顾国内与国际，从发展范式、空间路径、主体动能三大维度展开深度研讨。第一篇系统梳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脉络与五大核心经验，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总结出自主发展、民生导向、科创绿色、多元治理、互利合作的发展路径，结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困境提炼发展启示，为全球农业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第二篇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界定新质农民的核心内涵，全面剖析其赋能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的内在机理，直面人才、基建、公共服务、数字素养等现实梗阻，构建起全链条培育、多维度保障的长效机制，明确了高素质农民作为乡村发展核心主体的支撑作用。第三篇聚焦乡村振兴实施机制创新，从理论、历史、现实三重逻辑阐释片区化发展的生成依据，针对单村发展资源分散、产业同质、服务低效等痛点，提出协同治理、产业集群、普惠服务、宜居建设四大实践路径，为乡村全域联动、抱团共兴提供制度与方法参考。

期望本组研究能够丰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各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有益的学术参考与实践指引。

李卓，于王合子.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启示[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5（5）：19-28.
Li Zhuo，Yu Wanghezi.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ern[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6，25（5）：19-28.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6.05.003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经验及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启示

李卓[1,2]，于王合子[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农业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中国在探索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自主发展道路，其主要经验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农业发展道路，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路径，而非照搬西方规模化或资本密集型模式；始终以减贫与共享为核心导向，将提升民生福祉与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通过产业扶贫、农村电商、乡村CEO等举措推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并重，推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发展，注重生态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构建国家主导与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合力；注重加强农业国际合作与经验共享，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分享自身实践，超越西方传统援助模式的霸权逻辑与依附性陷阱。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自主探索，超越了西方发展模式的桎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兼具主体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启示，在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中贡献了区别于传统西方范式的中国方案与实践智慧，对推动构建公平、共享、可持续的全球农业治理新秩序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独立自主；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国家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6）05-0019-10

收稿日期：2026-01-21 **修回日期：**2026-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24CKS064）
作者简介：李卓，研究方向：农村发展与城乡治理。

一、研究背景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成效，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进程与质量。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基础上，以独立自主、以人民为中心、科技引领、生态优先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特征的发展道路，这一路径不仅突破了西方资本密集型、规模化农业的单一范式，而且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协同，实现了粮食安全、减贫共享、绿色发展与治理效能的多重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发展目标与价值理念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困境，中国所倡导的发展理念与现代化路径，特别是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与危机所贡献的中国智慧，正吸引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其经验对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实践启示。

“全球南方”作为学术与政治概念，正从传统的地理概念向具有政治、文化、心理内涵的认知共同体转变，逐渐变为一个基于共同历史遭遇、相似发展任务与集体国际利益而形成的政治经济聚合体，其主体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1]。这些国家曾普遍遭受殖民统治与侵略，在二战后陆续取得民族独立，并将推进国家现代化、谋求发展与公平视为共同的核心使命。全球南方国家在传统的现代化道路上，长期陷入“依附式增长”困境，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可归结为“中心—边缘”理论与“依附理论”所剖析的不平等国际分工秩序[2]。在这一秩序下，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借助技术垄断、资本支配与规则主导，将边缘国家固定于产业链底端，导致其长期依靠初级产品出口，陷入“低端锁定”状态，产业升级与自主发展因而举步维艰[3]。“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揭示了国际社会中现代化治理的新机遇，也映照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日益呈现的碎片化态势[4]。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长期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深刻反思，同时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和包容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普遍期待。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同现代化”，致力于构建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发展范式[5]，为全球南方国家走出依附式发展困境提供了可能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统领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在此宏大背景下，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也日益清晰，它并非孤立的产业现代化，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从早期追求“农业机械化”的单一技术目标[7]，到党的十八大以后，被纳入“新四化同步发展”的国家战略[8]；再到党的十九大之后，与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目标是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9]。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在不同方面也与中国式现代化一脉相承。在路径上，坚持“大国小农”国情下的独立自主，走“并联式”发展道路，推动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10]；在目标上，不仅追求“农业高质高效”，更强调“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体现共同富裕导向[11]；在理念上，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12]。中国式现代化立足自身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这一成功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实现发展，中国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有别于传统西方模式的可能路径，增强了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信心，也推动现代化路径从国别实践升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形成的独特发展道路。其源头可追溯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曾提出工业、农业、交通、国防“四个现代化”[13]。

1957年，毛泽东首次将“科学文化”纳入现代化范畴，凸显了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14]。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告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15]，并提出“两步走”战略，标志着现代化从“工业化”单维推进跃升为涵盖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始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区别于西方殖民扩张型的现代化路径[16]。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基于国情洞察，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将标准从“赶超西方”调整为“实事求是”，以“小康”为阶段性目标，并提出“三步走”战略，实现了从“物质优先”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转向，开启立足本土的自主探索[17]。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明确指出其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大特征[18]，实现了现代化内涵从“经济—科技—国防”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性拓展。这一系列理论创新，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对外扩张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等为重要特征的文明新形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中国式农业现代化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6]。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十五五”时期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演进来看，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经历了五个深化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完成土地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确立集体所有制基础；从1978年到1986年，以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经营主体重构；从2004年到2012年，聚焦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启动取消农业税，实现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转型[19]；从2013年到2016年，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提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从2017年至今，乡村振兴锚定“农业强国”建设，明确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营体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相协调的“五强”实践路径[20]，政策主线始终围绕“保供—增收—强基”的逻辑层层深化，始终保持高度战略定力[21]。

从理论建构来看，学界已经形成具有解释力与规范性的分析框架。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论。学界普遍指出现代农业具有高劳动生产率、高机械化率等共同特征，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主体、道路、模式、政策、治理和价值等方面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特征[22]，中国必须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坚持“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底线思维[23]，走出兼顾规模效率与小农包容的发展道路[24]。二是“三化”统筹发展论。强调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须同步推进、一体设计，避免单向抽取农村要素导致“空心化”，而应通过县域载体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25]，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格局[26]。三是农业的功能拓展论。这一研究群体主张突破传统经济功能观，强调农业兼具生态涵养、文化传承、康养休闲、碳汇调节等多元价值[27]，推动农业从“产品农业”向“功能农业”跃升，为农民增收开辟经营性、财产性和功能性三重渠道[28]，这共同构成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区别于西方模式的学理标识。

综上所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替代方案，其核心在于坚持国家自主性，强化制度能力建设，注重包容性增长与生态可持续的平衡。这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启示是，农业现代化不应是被动接受外部标准的过程，而应成为重建本土知识体系、增强粮食主权与实现社会公平的战略工程。因此，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过程中，系统地总结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经验

（一）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农业发展道路，破除西方农业现代化模式的迷思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在深刻把握本国国

情基础上进行的独立探索，其核心在于立足现实而非照搬西方模式，并在实践中持续演进和不断完善，形成了系统性政策框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演进维度。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依据“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拒绝照搬西方规模化或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农业生产力的演变经历了从人力为主、人机并重，到机械与化学品主导，再到机械、化学品、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共同驱动的四个阶段[29]。与之相应，生产关系也从简单的小农经济，逐步转向社会化协作，继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并进一步发展为系统化、综合性的新时代农业农村生产关系[30]。这一过程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并非简单走向单一化或规模化，而是沿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升级的路径持续拓展深化。

第二，小农户主体定位维度。中国摒弃了“小农户必然消亡”的西方叙事，确立了小农户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长期主体地位，并着力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长期以来，小农户在中国农业中占据主体，却常常被视为落后而需被改造的对象[31]。党的十九大以来，政策导向发生根本性转变，确立小农户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长期主体地位，这意味着小农户不仅不会消失，还将通过融入现代农业体系转型为“现代小农户”。中国不仅通过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实现了小农经济的现代转型[32]，还进一步归纳出“服务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即通过社会化服务外包实现专业化分工，而非追求土地集中[33]。这一路径挑战了西方“规模即效率”的教条，体现了中国道路的独立性与适应性。

第三，战略与政策体系维度。中国始终将农业现代化置于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的总体框架中，形成了系统而持续的脉络。政策重点从确立道路框架，到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再升级为强化粮食安全与耕地红线，体现出鲜明的战略连续性，明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国家安全内涵。体制上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与双层经营体制，通过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适度规模经营，有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规避资本主导和土地兼并风险[34]。在实践中，传统的“种养结合”生态模式得到保留，增强了农业本身的可持续性[35]。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农业现代化应始终立足国情、自主探索，在坚守安全底线与体制特色中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立足国情，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升级为主线，在历史脉络中持续调适二者的关系，其核心特征是正视“大国小农”的现实，并通过社会化服务与组织创新，使小农户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将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提升至战略高度，在坚守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推动技术、政策与市场有机结合，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证明了农业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为全球南方提供了有别于西方发展叙事的中国方案。

（二）中国始终将减贫与共享作为核心导向，以农业现代化促进民生福祉改善

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将促进民生福祉改善作为核心目标，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创新实践，成功探索出一条将农业现代化与减贫、增收和治理深度结合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这一路径有效规避了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脱节的“有增长、无发展”陷阱，其核心在于构建并实施了一套“产业筑基、电商赋能、治理护航”三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

第一，以产业扶贫夯实共享发展的经济基础，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产业扶贫被确立为脱贫致富的关键举措，旨在解决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各地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发展出“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等特色模式，将地方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产业升级。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得以稳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这一过程不仅创造了就业与收入，且从根本上培育了乡村的内生发展能力，体现了农业现代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理念。

第二，以农村电商打通共享发展的市场通道，赋能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农村电商的兴起，

为破解地理隔阂、实现城乡市场融合提供了革命性工具。作为国家扶贫十大工程之一，“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依托淘宝村、京东农场、拼多多助农等平台，构建了从产地直达消费者的扁平化流通网络[36]。电商不仅直接促进销售、增加收入，且深刻改变了小农户的发展模式，显著降低了市场进入门槛，使农民能够直面终端需求，提升了农户的议价能力。同时，倒逼农业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此外，电商还催生了物流、包装、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创造了本地就业机会，推动乡村经济迈向多元化发展，电商扶贫不仅是增收工具，更是培育农民市场意识与自主发展能力的关键途径。

第三，以治理与人才创新筑牢共享发展的组织支撑，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包容性。可持续的共享发展需要有效的治理体系与专业化人才作为保障。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基层治理与人才机制创新，“乡村CEO”模式的引入，为农村带来了专业运营理念，提升了乡村资产与产业的市场化运营水平。“第一书记”与科技特派员制度则有效推动了政策、技术、管理资源持续下沉，强化了基层组织服务能力。而“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改革，旨在整合生产、供销、信用合作，构建综合性为农服务平台，有效破解乡村发展的要素制约。这些治理创新确保发展红利能够更公平、更有效地惠及广大农民。

中国农业现代化坚持产业筑基、电商赋能、治理护航的协同推进，将农民置于发展中心，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应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这条路径以包容性政策与人力资本投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动诠释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它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也为全球减贫与乡村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中国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并重，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发展

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系统性地将科技自主创新与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合，构建了以技术驱动和生态优先为核心特征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回应了国内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也为全球农业转型提供了兼顾效率与可持续性的中国方案。

第一，以理念引领与顶层设计确立绿色发展的根本遵循与生态底色。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绿色转型，首先源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指引与系统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将生态保护与资源节约确立为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价值导向[37]，这使中国农业的发展目标从单一追求产量增长，转向统筹生产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农业发展被赋予了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功能，确保技术创新与产业实践始终沿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向推进。

第二，以绿色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提供转型的核心手段与具体路径。在明确的目标导向下，中国高度重视并系统推进绿色技术创新、集成与应用，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工具箱，具体措施涵盖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生物农药、数字农业等关键领域，并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与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进行示范推广，这一过程形成了政府主导、科研支撑、市场主体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实践表明，龙头企业研发绿色产品并带动合作社实现生态溢价，使绿色发展得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竞争优势[38]，这一“绿色—高效—增收”协同的技术路线图，为面临类似生态压力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

第三，通过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创新构建农业绿色转型的长效激励机制。中国系统性地整合政策工具与市场手段，形成激励相容、保障有力的驱动体系。在政策层面，应建立绿色生态导向的补贴体系，强化对绿色技术与生态修复的支持，并创新金融产品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态友好型项目[39]。在市场机制方面，着力发展绿色、有机及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健全优质优价机制，使绿色生产者获得切实市场回报。同时，依托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开展区域差异化绿色发展模式的集成与推广，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为农业内涵式发展提供持续且稳定的制度支撑。

中国通过“理念定标、技术赋能、制度护航”三位一体的系统实践，成功将农业现代化进

程与绿色发展深度绑定，这不仅是依靠科技创新提升效率，更是通过生态保护实现永续发展的主动战略选择。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生产发展与生态富民协同并进的新路，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四）中国始终坚持国家主导与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推进农业现代化

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构建了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活力社会”协同联动为特征的复合型治理体系，这一体系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持续的机制创新，实现了政府引导力、市场驱动力与社会参与力的有机融合，形成了多方共促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合力[40]。

第一，政府发挥战略引领与制度供给作用，构建上下联动的政策实施体系。中央通过“五年规划”及中央一号文件确立战略方向，形成连贯性较强的政策框架。地方则通过示范区与改革试点探索实施路径，构成从宏观部署到微观实践的传导闭环，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但仅靠政府主导不足以实现内生发展，市场自由竞争虽创造财富，却无法自发援助弱势群体。因此，政府在担任“战略引领者”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再分配者”的关键角色，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矫正市场失灵，确保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41]。这种“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的双重机制，既保证了现代化的效率，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的有机统一。

第二，政府通过改革等举措来培养和规范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三权分置”改革放活了土地经营权，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与适度规模经营，优化了要素配置[42]。同时，完善征地补偿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显化了土地价值，增强了农民财产性收益。经营层面，政府应着力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并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共享机制，最终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43]。此外，改革通过设定投资强度、环保与产出等准入条件，引入专业运营机构进行监管，构建了兼顾效率与规范的混合治理模式，提升了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与标准化水平[44]，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现代化格局。

第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治理与服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协同网络。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与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提供社区化服务、凝聚乡村共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许多地区探索由村集体出资成立公司，领办合作社并引入专业团队运营，在盘活集体资产的同时，通过“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机制将农户与集体利益紧密联结，并通过综合合作改革，整合分散的服务资源，构建了综合性为农服务平台[45]。此外，一些地区利用互联网平台，将政府监管、企业服务、合作社生产与农户需求进行在线整合，形成跨主体、跨层级的协同治理网络，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与政策响应的整体效率。

中国农业现代化形成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格局，政府主导战略与公平，市场激发效率活力，社会力量增强包容韧性。这种动态平衡的制度安排规避了单一手段的弊端，有效实现了资源整合与风险分散，为农业现代化所需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富有弹性的制度框架。

（五）中国始终注重加强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与农业知识经验学习

中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分享自身发展经验视为重要责任[46]，通过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等多双边平台，推动以“平等互惠、能力共建、自主发展”为特征的农业国际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与发展路径[47]。这种以实效为导向、以赋能为核心的合作模式，超越了传统援助的依赖性逻辑，致力于增强合作国的内生发展能力，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农业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力量。

第一，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构建适应发展需求的务实合作框架。中国的农业国际合作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援助体系中常伴随的条件附加与制度移植模式，转而倡导并践行一种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合作聚焦于回应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粮食安全、减贫与农业发展需

求，通过对话协商共同确定优先领域与项目形式。在此原则下，中国主要依托南南合作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搭建多渠道、多层次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网络。这种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合作框架，重建了发展合作中的主体间关系，将受援国视为平等的伙伴，共同致力于解决具体的发展挑战，从而为长期可持续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情感基础。

第二，以适用技术为载体，推动惠及民生的具体成果广泛落地。中国在国际农业合作中，特别注重选择与推广“接地气、见效快、惠民生”的适用技术与管理模式，被誉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已在亚洲、非洲的数十个国家成功推广种植。通过本土化适配与示范，该技术显著提高了当地水稻单产，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中国方案”[48]。同时，适合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节水灌溉技术、农作物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治技术、性价比高的小型农机具以及“农户＋合作社＋企业”的产业组织模式等，这些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专家顾问、开展人员培训、进行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被系统引入合作国家，并在当地实践中不断调整优化，真正做到了“落地生根”。

第三，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培育内生可持续的自主发展动能。21世纪以来，中国设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平台，并加强相关学科建设，深化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实践的知识积累与人才培养[49]。在非洲、亚洲援建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它们不仅是技术展示的窗口，更是集试验研究、技术培训、本地化改良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通过长期驻扎与平台化赋能，深度融入当地。这种“授人以渔”的模式，重在培育伙伴国自主设计、实施与创新能力，使其最终能够不依赖外部援助，独立推动本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为构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国际农业合作的核心，在于分享注重实效、尊重差异、赋能自主的发展哲学，它以适用技术为桥梁，以能力建设为根本，将解决粮食安全这一共同挑战置于首位，推动合作成果惠及各国民生。这一模式为深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全球农业治理体系，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经验。

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启示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突破发展困境、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农业转型路径，提供了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方案的重要参照。其核心启示在于，系统解构了将农业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单一叙事，构建了一个以国家能力建设为基石、以民生福祉为导向、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动力、以绿色可持续为约束的复合型发展框架。这一框架超越了“援助—依赖”的传统逻辑，强调通过本土化的制度创新与知识适配，将普遍性的发展目标与特定国家的历史、社会及生态条件有机结合，从而为实现自主的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可能。这不仅是对发展理论的丰富，更是对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原创性贡献。

（一）全球南方国家应增强农业发展道路选择的自主性

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核心在于坚持发展道路的自主性，警惕“土地私有化＋资本整合”等外部模式带来的社会分化风险，应立足于本国资源禀赋、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自主制定农业发展战略，确保国家在农业转型中的主导权，维护农业系统的自主性与安全性。在路径选择上，需重新审视小农经济的定位，以“组织化＋服务化”双轮驱动实现包容发展。一方面，通过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载体，在稳定家庭经营基础上实现资源整合，借鉴中国“统分结合”经验，提升小农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应建设覆盖全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技术推广、市场信息等支持弥补小农短板。总体而言，南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应走一条以自主战略为引领、以小农为基础、以组织与服务为支撑的道路，既注重发展成效，更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农业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二）全球南方国家应以优先解决民生问题为发展导向

全球南方国家应将解决好民生问题深深嵌入农业现代化之中，从“唯GDP增长”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其核心在于将减少贫困与改善民生确立为战略的核心衡量标准。此

外，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普惠金融、技能培训等定向政策工具，保障小农、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市场接入权与收益分配权，实现农业发展与农村区域发展的深度融合。同时，技术范式必须从不可持续的“褐色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型，将绿色发展理念内嵌于农业政策全过程，通过绿色补贴、生态补偿等机制激励环境友好型生产，并优先投资和推广资源节约型技术，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保障农业长期韧性与绿色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此外，还必须将农民增收与农村公共服务提升作为政策核心，从根本上避免“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

（三）全球南方国家应不断加强国际农业交流与学习

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是立足本国国情与发展阶段，选择适宜的技术和道路，以绿色农业为导向，注重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对外合作上，全球南方国家应借鉴中国“授人以渔”的南南合作理念，通过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帮助合作国形成内生发展能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推动国际合作从“依赖援助”转向“自主发展”型伙伴关系。在具体实践中，坚持“本土化适配”原则，将引进的外部经验与本地自然条件、知识体系相融合，使其真正扎根本国，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此外，南方国家在气候环境、作物结构及小农形态上高度相似，其成功经验与技术方案更具可移植性，需要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效的互助，最终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全球农业新格局。

（四）全球南方国家应不断强化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全球南方国家需构建稳定连贯的农业发展政策框架，统筹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农业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求治理模式从“单一主导”向“网络化共治”演进，建立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有为政府至关重要，应承担确立规则、供给公共产品和纠正市场失灵的核心功能。中国经验表明，治理能力与改革意愿是推动农业变革的前提，国家能力不足往往是发展停滞的关键制约。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必须激活基层内生动力。为此，应着力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沉睡资源。同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和涉农企业，从而构建多层次治理网络。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协作互动，更精准地回应基层的多样化需求，形成可持续的农业发展合力，确保农业转型在制度保障与多元共治中行稳致远。

五、结语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深化的系统性实践。它根植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依托独立自主的制度安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科技创新的驱动机制、绿色发展的价值导向和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又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农业转型之路。通过对五大核心经验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粮食安全、减贫成效、生态保护等具体目标上，更体现为构建了一种以内生能力为核心、以制度创新为支撑、以包容性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范式。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地缘政治动荡、粮食安全风险升高，全球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将愈发复杂。中国应继续深化农业制度创新、科技突破与治理升级，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巩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基础。同时，要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农业发展实践的比较研究，探索更具适配性的国际合作机制，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公平、可持续的全球农业治理体系，在多元文明的对话与互鉴中，实现人类共同的现代化愿景。

参 考 文 献

[1] 胡继平，田渝申．“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心理逻辑及中国的合作回应[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4）：4-16.

[2] 卢凌宇，宋博文．从依附理论到新依附理论：兼论新依附理论对中国与后发国家经济合作的评价[J]．教学与研究，2025（1）：115-131.

[3] 杨雪冬，李睿哲．共同现代化：一种正在形成的现代化范式[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4）：26-40.

[4] 关孔文，王强．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全球南方”所面临的挑战与改革路径[J]．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6）：12-19.
[5] 杨宜勇，杨泽坤．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南方”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6）：1-11.
[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1).
[7] 豆书龙，朱晴和，周静，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发展脉络和展望[J]．农业经济问题，2024（3）：54-71.
[8] 洪银兴．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维度[J]．管理世界，2022，38（4）：1-15.
[9] 胡海，庄天慧．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24，42（1）：126-134.
[10] 邱海平．系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2-14.
[11] 刘建生，郝柯锦．共同富裕目标下和美乡村建设机制与路径研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4（4）：91-99.
[12] 黄承梁．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历史必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33（4）：196-204.
[13] 代玉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逻辑——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J]．浙江社会科学，2022（1）：4-11.
[14] 任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8（4）：23-32.
[15] 石仲泉．邓小平与中国式现代化[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5）：1-14.
[16] 许耀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拓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加力[J]．科学社会主义，2023（1）：16-24.
[17] 刘伟．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37（1）：1-18.
[1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19] 樊祥成，许英梅．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历史任务与实践要求[J]．理论学刊，2024（1）：32-40.
[20] 陈明．农业强国、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代“三农”政策范式解析[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39（3）：29-35.
[21] 蓝红星，王婷昱，施帝斌．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与推进方略[J]．改革，2023（7）：105-115.
[22] 匡远配，彭云，李姗姗．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重逻辑、基本特征及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24（12）：2-22.
[23] 黄祖辉，李懿芸，毛晓红．我国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现状与对策[J]．江淮论坛，2022（4）：13-21.
[24] 桑坤，郭婉莹，柯雪龙，等．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6）：185-201.
[25] 张永江，袁俊丽，黄惠春．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历史演进、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3（12）：4-16.
[26] 张辉，杨照，郭巧苓，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方位[J]．农业经济问题，2025（5）：24-38.
[27] 吕新业，万广华，刘景琦，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特征、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J]．改革，2024（9）：125-137.
[28] 毛飞，孔祥智．中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态势和未来取向[J]．改革，2012（10）：9-21.
[29] 罗必良，耿鹏鹏．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4（4）：13-26.
[30] 李锋，江灿．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2）：1-12.
[31] 杨志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百年探索、理论内涵与未来进路[J]．经济学家，2021（12）：117-124.
[32] 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J]．开放时代，2020（4）：126-139.
[33] 罗必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抑或情境依赖？——兼论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及未来趋势[J]．社会科学战线，2020（1）：38-51.
[34] 高鸣，魏佳朔，宋洪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J]．改革，2021（9）：121-133.
[35] 温铁军，董筱丹，石嫣．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10）：88-94.
[36] 王昕天，康春鹏，汪向东．电商扶贫背景下贫困主体获得感影响因素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0（3）：112-124.
[37] 仇焕广，黄青．农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J]．农业经济问题，2025（2）：

15-23.
[38] 金铂皓，马贤磊.生态资源禀赋型村庄何以实现富民治理——基于浙南R村的纵向案例剖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4（6）：87-104.
[39] 尹昌斌，程磊磊，杨晓梅，等.生态文明型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1）：15-21.
[40] 李卓，郑永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产业振兴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基于A县产业扶贫实践的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2022（1）：162-168.
[41] 唐任伍，李楚翘.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基于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的考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1）：49-58.
[42] 姜海，田双清.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实践经验与改革共识[J].农业经济问题，2024（8）：42-58.
[43] 仝志辉，杨润峰，罗建章.乡村特色产业的嵌入式内源发展路径——以四川省石棉县坪阳合作社黄果柑产业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23（8）：31-43.
[44] 李宝值，钱文荣.“农业标准地改革”及其理论诠释[J].农业经济问题，2024（3）：116-127.
[45] 吴彬，徐旭初，徐菁.跨边界发展网络：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逻辑——基于甘肃省临洮县的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2（12）：59-72.
[46] 卓振伟，刁浩原.一致与互补：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实践的复合逻辑[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6）：20-31.
[47] 田鹏颖，魏亦实.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理念、实践与未来[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4）：53-64.
[48] 廖伏明，罗闰良，万宜珍.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现状与策略[J].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1，12（2）：178-183.
[49] 王健，任琳，吴洪英,等.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J].西亚非洲，2023（6）：3-33.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ern

Li Zhuo[1,2]，Yu Wanghezi[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2.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Center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modernization for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hina has developed a path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l. The main experiences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adhering to an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basing itself on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large country with small farmers", choosing a modernization path that suits itself rather than blindly copying the Western models of large-scale or capital-intensive; always prioritiz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shared prosperity, closely integ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s with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by the peopl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e-commerce, and rural CEOs; emphasizing the equal import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promot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evelopment, and focusing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is led by the state and involves multiple stakeholder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guid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and forming a joint forc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perience sharing in agriculture, sharing its own practic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transcending the hegemonic logic and dependency traps of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aid models. China′s autonomous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as broken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models, providing inspiration for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autonomy, inclus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It has contributed Chinese solutions and practical wisdom that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Western paradigms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system for development, and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a new order of fair, shared, and sustainable global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Keywords：Chinese styl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Independence and self-relianc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Green development；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